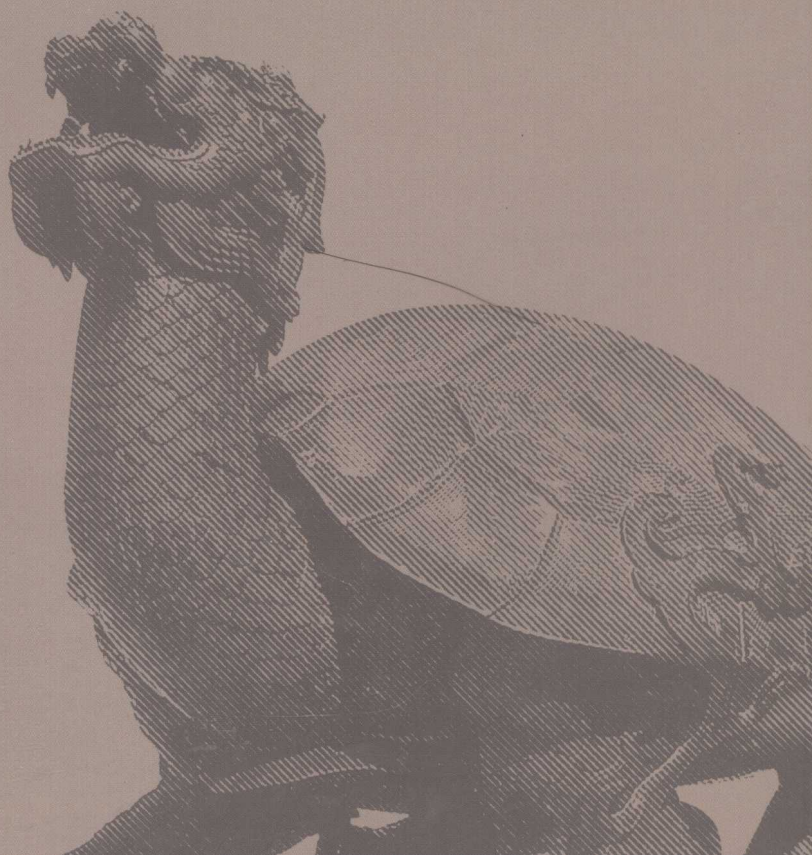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曹树基 主编

——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

田祖有神



田祖有神

——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
曹树基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313-04728-1

I. 田… II. 曹… III. ① 自然灾害-灾害防治-案例-中国-近代 ② 自然灾害-灾害防治-案例-中国-现代 IV. X4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920 号

田祖有神

——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

曹树基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877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立信会计出版社常熟市印刷联营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6.75 插页:4 字数:573千字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

ISBN 978-7-313-04728-1/X·014 定价: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曹树基

1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文集,是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的最终成果。之所以确定这一课题,不仅是因为近几年来中国灾荒史的研究方兴未艾,高水平的成果层出不穷,也在于环境的变化,让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减灾防灾已经成为一个恒久性的公共话题。因此,对于这一史学分支学科的发展,除了增加案例式的研究,我们还有理由思考其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是本项目展开的基本出发点。

这部由 14 篇论文构成的文集,是一个集体项目,参加者有 16 人之多。计划每人(或两人合作)完成 1 个子项目,每个项目提交的研究报告约 3~4 万字,合计约 50 万字。如果将 14 篇研究报告整合成研究专著,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能的。按照国内学术界的通例,此类专著将开列所有参加者的名单,明确说明每个章节的作者,作者的著作权似乎得到了保障。然而,国内其他学者在引用这些成果时,很少会有人将章节作者的姓名引出。一般情况下,只提主编。这样的主编制度事实上造成了对于项目参与者的不公平。如果是本文集,即便按照国内学术界的通常作法,也是先引论文作者名,再注明出自何人主编的哪本文集。作者的权益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失。这是本书最后采用文集的方式进行撰编的基本理由。对于本书而言,撰稿者大多数是刚出校门的年轻硕士或博士,也有尚在校就读的年青的博士生,还有在基层实际部门工作的朋友。完成一项研究,尤其是较高水平的研究,对于他们来说,实属不易。因此,充分尊重他们的研究成果,维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对于作为主编者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因此,本项目的最后成果确定为文集而不是专著。

在项目启动之初,我要求书中所收论文都是首次发表的作品。在本书出版之前,各子项目负责人不得在其他刊物发表本项目论文。在操作过程中,大多数作者都遵守了这一约定,即便是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也作了较大的修改与充实。感谢所有合作者的理解与投入,使得本文集大致能以一个原创性作品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有朋友对我的这一做法感到不可理解。其理由是,将来这批论文不可能在期刊网上查到,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我的答复有二,其一,如果都能够在期刊网上查阅,人们可以很快在自己的电脑中编出本书,既然如此,本书的出版就没有必要。其二,现在的学术期

刊,对于字数的要求越来越严。一般的学术刊物,要求的字数不超过1万;一些高档次的学术刊物,字数也不可以超过2万。这一篇幅的限制,实在很不利于一些大项目的展开。以我个人的写作经验,有时候,光是在论文开始时提出问题,就需要花费相当大的篇幅。因为,几乎所有的学术问题都是学术发展的结果,不可能凭空而生。越是较大的学术问题,牵涉到的头绪往往越多。提出问题的过程,就是对这一专题及相关专题的学术史进行梳理的过程。对于已有的相关成果作出准确而精炼的评述,当然最好,但却不容易。三言两语,往往不可能讲得清楚。过于严格的篇幅限制,常常令研究者感到困窘不安。经过认真和细致的编辑,本书中所收各篇论文的长度一般都在3~5万字。既然很少有学术期刊能够发表此类长文,那么,本书的出版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论文的作者主要是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工作时的学生和同事,只有两篇论文出自其他单位的研究人员。之所以这样确定人选,是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学生和同仁,都更熟悉中国灾荒史的研究,他们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有不少取材于此;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大抵与此有关。另外,他们总是以某个区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点,很符合灾荒史研究的基本理念:灾荒史首先是区域史。收集在本书中的十几篇论文,就分别涉及西北、华北、内蒙古、西南、中南、江南和岭南七大区域。在原来的计划中,每个地区至少应包括两篇论文,由于种种原因,有研究者未能按时完成计划,故部分地区论文有阙。至于其他地区,则因研究力量不足,未能涉及。

2

本书第一部分题名为“文化与生态”,包括三篇论文。作者们分别讨论了以陕西蒲城县尧山为中心的179个村庄的女神信仰及与之相关的抗旱史,云南省澜苴河流域的生态特点与水灾的关系,以及云贵高原地区的水灾与水利,以“文化、生态”为核心,展现人与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文化的角度展开灾荒史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并积累有一些精彩的案例。这篇以陕西蒲城县尧山为中心的研究,之所以还能激发读者阅读的兴趣,在于作者将民俗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融为一体,并将物质层面的抗旱史,引向以尧山圣母的祈福和祭祀为形式的精神层面的抗旱史。这就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获得了对于西北干旱地区民众生活史全新的理解。

传统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似乎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历史文献少有如此详细的记载,让我们可以窥探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代代相传且版本不同的圣母故事;虔诚且淳朴的敬神之心;古老且充满活力的神楼巡游;繁琐且循规蹈矩的祭祀仪式;复杂且有秩序的村社权力结构。只有人类学的近距离观察和体验,才可能让我们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使乡村抗旱史的书写,充满了泥土的气息。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论文是作者参加中法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的一个成果。在该项目组已经出版的四部著作中,我们还能读到秦建明与吕敏(Marianne Bu-

jard)合作的《尧山圣母庙与神社》^①,与本文处理的是同一批资料。本文对于圣母传说的各种不同文本以及对圣母祭祀风俗的解释,用力甚深,与秦、吕之合著相得益彰。上述各项研究,已经成为我们理解北方旱作地区民众生活与基层社会组织的标志性成果。

从生态学角度展开灾荒史之研究,虽然已经成为灾荒史研究的主要方式,但大尺度的研究,往往很难具体入微地展开对于某一特定区域人地关系的研究。以水灾史的研究为例,近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注于一些小河流域。很显然,由于研究对象的缩小,研究者有可能对史料进行深入的发掘,对于人地关系的叙述,可能更为全面和深入。在有关瀾苴河流域水灾的研究中,作者最大的贡献在于其慧眼独具,敏锐地发现影响瀾苴河水患的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流域中一个只占全流域面积2%~3%的狭小的敏感地带的生态扰动,却造成全流域性长期的生态破坏。这一结论,让我们重新思考有关环境变迁或生态变迁的真正含义。

第三篇论文涉及的空间尺度虽然很大,大到以整个云贵高原作为研究对象,但作者还是在细部的处理上,将高原划分为滨湖盆地(包括坝区)和山地两种不同的地貌,使得其研究的范围,迅速缩小到一个作者可以自如操控或可驾驭的尺度。这样一来,作者便可展开其关于云贵高原以水利化活动应对当地水旱灾害的讨论。本文最大的贡献在于作者将云贵高原的农田水利问题的经济性质转向生态性质。将这篇文章与瀾苴河研究的论文联系起来分析,可以发现,两项研究最终都走向了同一个归宿:山地的垦殖导致了水土流失,影响了山区土壤正常蓄水和河流正常泄水的功能,水旱灾荒也呈逐渐严重之势。与之相应的,则是农田水利功能的转换。筑堤防涝、蓄水抗旱,差不多成为西南地区抗灾救灾的全部。这一过程,既属于环境的经济学,也属于经济的环境学,颇值得人们思考与关注。

本书第二部分题为“灾荒与应对”,也包括三篇论文。作者们分别讨论民国时期的河南灾荒、清代的江西灾情与明代北方的灾荒性移民诸问题。这三篇论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将政府的赈灾、救灾及其安排灾民的措施当作叙述的重点。

从方法论上讲,这一组论文的叙述与讨论大体依照“灾情一应对”这一历史学的经典模式展开,并与本项目的主题密切相关。在这一叙事模式中,作者们依时间与空间的不同格局,排比史料,交待事件,分析因果。一些基本结论,颇值得玩味再三。

例如,关于民国时期河南灾荒的研究,作者是在“转型中的政府”或者“民国政府的现代性特征”这一框架下展开的。作者认为,民国时期河南的赈灾史表明:“一个转型中的政府越来越有力地确立自己在赈灾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既是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政治成长的过程。这一论点,富有新意,且具启发性。

作为比较,从清代江西的赈灾史来看,政府的表现相当糟糕。无论从蠲免、缓征、赈济,还是平糶与借贷,财政能力衰减导致政府的救灾能力减弱。尤其是在19世纪以后,政府的报灾与勘灾效率降低,荒政走向衰落。

^① 秦建明、(法)吕敏(Marianne Bujard):《尧山圣母与神社》,中华书局2003年版。

上溯至明代,明代北方灾荒频仍,却几乎不见政府的积极应对。灾荒性移民所构成的流民大潮,使得处于严重灾荒蹂躏之中的北方,被作者称为“灾荒社会”,指的是灾荒的侵迫已使整个社会窒息与扭曲。政府本应通过救灾来纾缓灾情,却常常以驱逐流民来激起社会更大的动荡。流民运动最终成为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本文作者将明清时期北方中国社会的性质定义于“灾荒社会”,确有独到之处。只不过,严格地说,停留在文献层面的历史学研究尚不能完全达到这一论证的目标。有兴趣者如果将此文与上述中法专家合著之另一本著作《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②结合起来阅读,就可以明了经常发生的灾荒如何造成中国北方普遍性和持久性的贫困。在这个案例中,至少近800年来,晋南地区霍山山脚一个名叫“四社五村”社区中的十几个村庄围绕着一條细小的泉水生存,水的流量仅仅能够勉强维持人畜饮水,不能灌溉,不能洗澡——当地居民从出生到婚嫁都一直不洗澡,村民一直与干旱共存,“承受着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贫困,但却一直生存,可以作为这十几个村庄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这种“环境性贫困”与本文所描述的明代北方中国所不断遭遇的特大旱灾,正可互补。结合这些精彩的个案,将明清时期的北方中国称为“灾荒社会”,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第三部分为“生态政治学”,包括五篇论文,分别讨论1928~1930年的关中大旱、明清时期嘉定、宝山两县因赈灾设厂而导致的地域政治的变迁,民国时期浙江省政府为治虫而实施的颇具现代性质的全民动员、1950年代内蒙古哲里木盟政府为消灭鼠疫自然疫源地进行的杀灭黄鼠的群众运动,以及内蒙古地区因国家介入抵御雪灾而引起的社会变革。

读者或许会提出疑问,在第二部分包含的三篇论文中,均涉及政府的赈灾与救灾,或不赈灾,为什么此类论述不能构成生态政治学。确实,在我看来,仅仅将政府的赈灾、救灾当作生态政治学可能过于简单。“生态政治学”主要讨论与某种特定的生态变迁过程相联系的政治过程,以及生态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灾荒与应对”的研究都能够被称为“生态政治学”。

以1928~1930年关中大旱为主题的研究论文,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是采用“灾荒与应对”的叙事模式,但在实质上,作者并未满足于对于灾荒及救灾过程的描述,而是以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为契入口,深入讨论灾后农业环境与种植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并借此回答关中社会结构中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关中无地主”。这样的讨论,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

关于明清时期嘉定与宝山的赈饥与政区关系的一项研究,则将赈灾史演变为一部地方的政治史。作者以充分的资料证明赈济之“厂”如何在清代中期以后,经过乡绅的运作,最终演变为一个相当正式的地方行政序列,并以地方自治作为其归属。此类研究,实在让人分不清究竟是灾荒史还是政治史。另一篇关于民国时期浙江省政府治虫内容的论文则与之相反,讲述的是治理虫灾过程中,浙江省自上而下的政治强制:官僚体制的层层施压,

② 董晓萍、[法]蓝克利:《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中华书局2003年版。

民众在压力下被“动员”。这一切的目标指向却是“现代化”。这两篇论文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互为补充,不能不让我们思考从传统至现代中国政治演变的轨迹。

关于1950年代哲里木盟鼠灾治理一文,处理的对象主要是哲里木盟(今改为通辽市)所属七个市县的野外黄鼠和家鼠。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通辽县关于实现无鼠县的浮夸,何以会受到来自上级的批评,其错误的行为,何以能够得到迅速而有效的纠正?作者的解释是:一个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有可能对于无所不能的集权政治产生某种约束力。既使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年代,也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具有多元价值的社会存在。在另一篇关于草原抗击雪灾的研究论文中,作者通过细致的描述,证明1949年以后,国家的力量增长到几乎可以控制每个抗灾环节。而每个抗灾环节的运作,都与当时社会的整体结构密切相关。就这样,抗灾的组织和活动也就成了集体化制度结构中的一部分。

虽然这两篇论文都以1949年以后的历史作为关注的重点,而且都将环境史与政治史紧密相联。有意思的是,后者讨论的是内蒙古草原如何融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前者讨论的则是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中,内蒙古为何成为一个稍有不同的另类。环境的区域性特征,在建构大一统国家政治的同时,也可能形成对于这种政治的解构性力量。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研究蹒跚起步的今天,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进行的多维度的思考和研究,是有价值的。

第四部分为“微生物与社会变迁”,包括三篇论文,都是从微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的角度,讨论微生物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这是因为,因微生物活动引起的人类传染病流行,也是本项目定义的自然灾害。

从流行病学的观点看,鸦片战争时期英军中的传染病流行,曾经造成英军中大规模的非战斗减员。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如果清军能够得知英军的这一军事秘密,鸦片战争的历史有可能改写,而中国近代的历史也有可能改写。当然,虽然我完全明白,历史没有“如果”,但这一个“如果”实在是过于沉重,令人唏嘘。

关于上海城区霍乱病菌性质的研究,竟然会成为一篇历史学博士论文的主题之一,多少带有一些传奇的色彩。包含本文的博士论文,通过了公共卫生专家的严格评审,且获得好评,令人对青年一代的学术潜力,有充分的信心。我相信,经过适当的跨学科训练,将来类似的研究会越来越多。只有这样,疾病史的研究才有可能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也有可能达到更加深入的程度。

本书的最后一篇论文的作者来自鼠疫防治第一线。他们长期在广东省湛江鼠疫防治研究所工作,第一作者曾任所长。几年前,由于我对该所的一次访问,他们开始关注历史学界对于广东鼠疫流行史的研究。历史学家从逻辑上可以将历史时期雷州半岛上频繁出现的“大疫”推测为鼠疫,如果缺少微生物学家从本学科的立场为这一推测提供的证据,这一推测要为人接受仍然是相当困难的。本文两位作者的工作似乎预示着,历史学者与微生物学者的联手合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作为本项目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本书主编,在全部工作结束之际,我反复思考以下两个问题,以作为本项工作的总结。

什么是中国灾荒史的方法论?综合上述各篇论文,可知作为中国史学分支之一灾荒史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包容能力,既可以坚持历史学的本位,也可以展开跨学科的研究。相对而言,后者愈来愈显示出更为深刻的分析力以及更为宽阔的解释力。人类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农学、地理学、生态学、细菌学和流行病学的概念、方法与理论,都适用于灾荒史的研究。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者是不是具备了相应的知识,有能力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当不同领域的学者就一个共同的问题进行讨论时,研究者能有共同的语言吗?当彼此都不熟悉对方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时,研究者还能期望将研究推向深入吗?中国的灾荒史研究,正在面临这样的不断追问,本书正试图做出自己的回答。

研究的空间尺度,也属于方法论的问题。根据上文的评论,在各种不同的主题中,个案的研究,小尺度的研究,似乎更加适合,更应受到推崇。确实,对于灾荒史的研究来讲,我们需要更为贴近的观察,更富有质感的体会和更加精细的研究。在目前的阶段,各种来自基层社会及小社区的信息,都会让读者兴奋。正如我们在阅读本书的多篇文章中所感受到的那样。也正是在这里,历史学的困境,暴露无遗。不过,如果缺少大的历史背景作为观察的参照,我们有成为摸象盲人的可能。民众的日常生活,在许多情况下,只是琐碎的过程堆积。没有大历史作为参照,民众的日常生活似乎不构成历史。或者说,民众的日常生活只有活在大历史中,才有生命。历史本身就是这样构造的,人们生活,创造。许多偶然的事件打破了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喧闹过后,又是新的平静和秩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事件史仍有着不可掩盖的魅力。

将本书中两篇涉及陕西蒲城旱灾的论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就可以清楚地体会这一点。研究者有关蒲城尧山圣母祭祀的论文是一项关于北方旱区民众生活史的杰出研究。作者不仅研究旱区民众物质层面的抗旱史,也研究他们精神层面的抗旱史。另一篇关于1928~1930年关中地区抗旱史的研究,也涉及蒲城,且以蒲城为中心。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在关于蒲城尧山圣母的研究以及在中法项目组的研究中,这次大旱灾,只字未被提及。不仅如此,就是在民间传说中,也不见踪影。秦、吕合著的《尧山圣母庙与神社》一书,有一处民间传说提及史称“丁戊奇荒”的光绪年间的大旱:“话说光绪三年,是历年以来最大的年馔,整整三年大旱,六料颗粒未收。苍茫大地,寸草全无,树木枯死,大地裂缝……”^③这一民间传说在县境内广泛流传,具体文字录自2000年9月,由时年78岁的保南五中村民孙海口述。问题在于,当地村民对于离当时已有125年历史的旱灾回忆如此准确,何以对

③ 秦建明、(法)吕敏:《尧山圣母与神社》,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1~92页。

于离当时只有72年的大旱灾却无人知晓?有关历史的记忆怎么会舍近而求远?根据1928~1930年关中灾荒史研究论文所引资料,蒲城县饿毙3万余人,外逃6万余人。灾后减少人口占灾前人口的20%。按照我在《中国人口史》中的估计,在清代后期的回民战争和光绪大灾中,蒲城县人口死亡多达总人口的64%。^④1928~1929年的死亡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这样看来,在当地乡民心目中,1928~1929年还不是大灾荒?大约10%的人口死亡,难道会是当地民众生活的常态?依此思路,以“文化与生态”为主题的灾荒史,有着相当广阔的研究空间。

另外,作为事件的灾荒,就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观察政治过程与社会结构的最好视角。本书第三部分的五篇论文,都从不同的侧面对相关时代的政治过程和社会结构之变迁,提出了独到的解释。年青学者有关鸦片战争中的传染病史研究,则更是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大问题,提出颠覆性的观点。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灾荒史或许可以为中国历史学的变革提供舞台。

什么是中国灾荒史的核心问题,这是我反复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历史学者可能对“灾荒社会”的概念很感兴趣。然而,要准确地界定这个概念却不容易。研究者所认定的社会的“窒息”与“扭曲”,在一个小的社区中,很可能是常态。正是因为这一点,人类学者才将生存看作是一种文化,无论是干旱,还是其他。中法项目组的研究者将山西农民的格言当作全书的题记:“人活的就是个文化”,以表明他们的价值观。据此可知,研究者对于民众生活状况的理解与源于乡土的民众生活概念,有着很大的背离。

其实,以上这种背离,还有着其他的表现形式。如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山地的垦殖所造成的破坏,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之为一种“文化”。如果这也能成为“文化”的话,只能是一种“坏文化”。在生态学的概念里,人与自然保持着一种协调与平衡,这才是值得追求的最高理想。这一观点很容易得到疾病史研究者的响应,因为传染病流行的本质是处于平衡状态的微生物系统,以及作为其寄主的昆虫及动物的生活环境,被人类所扰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想状态的人口增长、农业垦殖,社会进步与政治发展,都应该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作为前提,也作为发展的目标。中国灾荒史,似乎可以从这一概念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归宿。所谓“灾荒”,只不过是这一概念的对立面而已。有了灾荒作为警示,在更多的时候,各种形式的“发展”理应让位于“平衡”。

从这个观念出发,民众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贫困、艰苦和死亡,就很容易被人当作一种“文化”来解读,被人施予某种冷酷的“同情之理解”。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假如我们面对那种无法想象的“环境贫困”,面对“水淹到脖子,一阵细浪也能将人淹没”的状态,也能像当事人一样保持一颗平常的心,不以为忤,习以为常,最后达到精神上的波澜不惊,才是人性的真正的“窒息”和“扭曲”。人的生命价值应有普世的标准,当事人的习惯不能等同于观察者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平衡”真的应该是“发展”的“平衡”。

^④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8页。

于是,中国灾荒史的研究,才会在这两个概念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

4

最后需要交待的是,本书的名称来自《诗经·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蠹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说的就是乡野阡陌农夫手执火把驱虫赶兽,护卫田禾的情形。书中的一位作者将其用作论文题名,取其消灭害虫,保护田禾之意。这也是本书的主题所在,故借用作书名。

目 录

序	曹树基
---------	-----

第一部分 文化与生态

I 旱作村落雨神崇拜的地方叙事——陕西蒲城尧山圣母信仰个案	庞建春	3
一、引言		3
二、水源形态和信仰——地形雨、庙和传承人群体		4
三、抗旱史与尧山圣母信仰——以地方志和碑刻为中心		8
四、尧山圣母传说的叙事类型		14
五、尧山圣母信仰与地方祭祀风俗——以清明接送神仪式为中心		19
六、结论		26
II 中小流域的人地关系与环境变迁——清代云南澜苴河流域水患考述 ...	杨煜达	28
一、引言		28
二、清代澜苴河水患的分期和特点		31
三、水患重压下的应对措施		36
四、水患的原因与其反映的环境变迁		40
五、结论		46
III 旱涝、水利化与云贵高原农业环境(1659~1960年)	杨伟兵	54
一、引言		54
二、旱涝灾害与农田水利		55
三、粮食主产区的水利化		60
四、山地农田的水利化		69
五、水利的分配与受益		74
六、结论		81

第二部分 灾荒与应对

IV 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及其社会应对	苏新留	85
一、水旱灾害等级序列的重建与时空分布		86
二、政府的应急:赈谷、赈款与施粥		93

三、政府的力量:平糶与移民	99
四、政府的现代性:工赈、除害与免疫	106
五、团体义赈: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111
六、结论	116
V 清代江西水灾及社会应对	张小聪 黄志繁 118
一、清代江西水灾的时空分布	118
二、“皇恩”与国力:蠲缓与救济	125
三、官与绅:平糶与借贷	134
四、以工代赈与伐蛟之术	141
五、效率与体制:官方应对的绩效	148
六、结论	154
VI 明代北方灾荒性移民研究	安介生 156
一、引言	156
二、“大灾之后,必有大逃亡”	159
三、“苛政重赋”与“救荒无术”	171
四、“随地居处”与附籍安置政策	175
五、“流民”与“流寇”的出现	185
六、结论	190

第三部分 生态政治学

VI 1928~1930年西北大旱灾及其社会应对——以关中地区为中心	郑 磊 197
一、引言	197
二、旱灾对关中地区的巨大破坏	198
三、大灾的社会后果	206
四、灾后重建:政府与农民	219
五、社会经济结构的新变化	226
六、结论	236
VII 赈饥与政区:明清嘉定宝山基层行政之运作	吴 滔 239
一、引言	239
二、清代以前嘉定县区划涵义的变化	241
三、从分厂事件到分厂传统	245
四、“厂董”职责的扩大和“(粥)厂”功能的转化	252
五、从厂镇合流到地方自治	257
六、结论	264
IX 田祖有神:治虫与政治强制式的现代化——以浙江省为例	丰 箫 266

一、引言	266
二、浙江省各地稻作虫害与社会环境	268
三、政府:强制的服务	272
四、农民:压力下的动员	278
五、结论:政治强制式的现代化	284
X 人鼠大战:1950年代的内蒙古草原——以哲里木盟为中心	曹树基 287
一、引言	287
二、环境、鼠与人	289
三、从消极防御到重点进攻	295
四、剿杀黄鼠的大跃进	299
五、战略、战术与武器	305
六、结论	311
XI 雪灾防御与内蒙古社会的变迁(1930~1980年)	王建革 313
一、风雪中的畜群与保护	313
二、移牧	317
三、保畜	322
四、预防	327
五、群众运动与制度协同	332
六、结论	336

第四部分 微生物与社会变迁

XII 鸦片战争中英军的传染病流行——以舟山为中心	齐敬霞 339
一、疟疾和痢疾:英军在舟山染疫	340
二、霍乱:英军与中国民众	351
三、结论	358
XIII 上海城区霍乱病史研究——以“地方病”与“外来病”的认识为中心	李玉尚 361
一、引言	361
二、上海城区霍乱流行史	362
三、“地方病”还是“外来病”	370
四、上海霍乱弧菌之演化	373
五、上海城区霍乱发生或流行的背景	380
六、华界、租界对霍乱的不同预防措施	386
七、结论	391
XIV 关于广东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再思考	沈荣煊 麦海 393

一、地理景观	393
二、宿主	395
三、媒介	401
四、病原	407
五、结论:疫源地的来源、现状和趋势	408

第一部分

文化与生态

